

新冠疫情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的演变与中国应对

史本叶 杨馥嘉

摘要 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加速向“超贸易”领域演变。中国的快速崛起与美国霸权主义之间的根本矛盾,叠加美国利益集团和精英阶层的强烈干预,使得中美竞争和摩擦长期持续,对中美两国产生多方面冲击,严重影响世界经济。一方面,拜登治下的美国政府所主导的中美贸易摩擦不会停止,反而会加速向高科技、国家安全、意识形态等“超贸易”领域扩散,呈现多点爆发、打击精准化、冲突常态化、竞争复杂化的特点;另一方面,中美战略竞争的整体方向不变,但美国对华竞争的手段和方式将趋于理性化和弹性化。中美仍然存在达成“竞合”关系的可能。中国应积极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向多领域蔓延,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关键词 新冠疫情;中美贸易摩擦;“超贸易”

中图分类号 F75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2)04-0087-13

基金项目 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委托项目(2019WT55);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
研究重大课题培育项目(2020ZDPY02)

自2018年3月以来,由美方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陆续经历多轮相互加征关税的关税战,直到2020年1月15日,中美双方签订《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美贸易摩擦阶段性放缓。然而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的暴发催化了中美贸易摩擦的进一步发酵,疫情横跨美国两任总统的执政方案,疫情背景下的中美关系更为复杂。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为转移抗疫不力的责任,大幅提升对中国的制裁力度,中美之间旧矛盾叠加新矛盾,双方冲突加剧。随着美国国内疫情的大暴发,美国经济严重衰退,美方从开始的赞扬中国抗疫工作迅速演变为公开指责中国,中美贸易摩擦非但没有因疫情出现缓和,反而在短期内迅速激化,从传统的贸易领域向高科技、国家安全、意识形态等“超贸易”^①领域扩散。美国遏制中国、维护世界领导地位的战略目标不会改变,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已经进入层次更深、范围更广的双方冲突博弈深水区。2021年1月20日,拜登正式宣誓就职美国总统,此后,中美竞争和冲突仍在持续并将呈现新的变化。厘清中美贸易摩擦发生演变的原因,准确把握后疫情时代中美冲突摩擦的发展方向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本文将从中美贸易摩擦演变的理论基础和现实逻辑入手,揭示美国对华遏制长期持续并向“超贸易”领域演变扩散的本质,分析这种冲突对中美双方和世界经济带来的多方面影响,研判中美冲突摩擦的发展趋势,提出中国可能的应对策略。

一、疫情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的演变及内在逻辑

疫情背景下美国持续对中国发起“超贸易”攻势,中美贸易摩擦加速向高科技、金融、国家安全、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国际舆论和规则制定等领域扩散。中美固有的结构性矛盾使得双方的冲突摩擦持续存在并不断变化,美国为维护霸权地位遏制中国发展的企图日益明显。

^① 本文将“超贸易”定义为:在贸易领域的基础上,中美竞争摩擦中涉及的高科技、国家安全、意识形态、金融、规则制定等其他领域的总称。

(一) 疫情背景下美国对华发起的“超贸易”攻势

中美贸易摩擦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并呈现结构性变化。当中美贸易摩擦出现结构性变化时,中美之间的矛盾冲突已经不再是局部的经贸问题,而是涉及多领域的整体性问题,影响中美关系的全局。这种结构性变化体现在中美冲突摩擦由贸易领域向多方面的“超贸易”领域演变,包括舆论竞争恶化、高科技和金融领域“脱钩”、意识形态冲突加剧和第三方因素凸显等方面,美国对华竞争全方位展开。

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对华发起从贸易到“超贸易”领域的全面攻势。随着美国疫情的大规模暴发,特朗普政府实施更为激进的对华政策,美国对中国的各方面打压愈演愈烈。

首先,美国对华发起舆论战,中美舆论竞争日趋白热化。美国对华舆论环境收紧,与疫情有关的阴谋论大肆发酵。美国曾公开将“新冠病毒”称为所谓的“中国病毒”,并扬言让中国承担责任,随之出现各地起诉中国、追责中国的闹剧。这一“甩锅”行为无疑是希望通过推卸责任释放国内压力,在大选中获得选举胜利的筹码,同时利用舆论导向进一步攻击中国,给中国贴上“不可信任”的标签。在中国向世界各国提供防疫物资的同时,美国等国家的西方政客和媒体开始散播“口罩外交”的荒谬论调,指责中国借此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力^[1](P233-248)^[2](P2-15)。美国借疫情抹黑中国的真实意图愈发明显,这一做法遭到了美国社会各界的抨击,美国《国家利益》杂志曾有题为《不要听信“中国隐瞒新冠疫情”的说法》一文,强调中国并未隐瞒新冠疫情的真实状况,美国“污名化中国”实则是希望将抗疫不力的责任推卸给中国^[3]。

其次,美国加快推动与中国的“脱钩”。第一,美国大力推进与中国的高科技“脱钩”,阻止高新技术输入中国,遏制中国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美国不断将中国企业及机构列入“实体清单”(Entity List)实施贸易管制,对抖音(TikTok)、微信(WeChat)等实施打压,并宣布清网行动。上述举动均是继华为之后,美国对华的进一步技术制裁,说明疫情下美国的“恐高症”加剧,对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技术封锁和审查升级。第二,美国开始酝酿对华金融“脱钩”。美国多次威胁考虑对涉港企业和金融机构进行金融制裁,陆续通过了《外国公司问责法案》(*Holding Foreign Companies Accountable Act*)、《新冠肺炎问责法》(*The COVID-19 Accountability Act*)等,制定一系列对中概股的调查措施,对中资企业赴美上市融资施压。2020年7月4日,美国发布了《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The Global Magnitsky Human Rights Accountability Act*),有实施小范围金融制裁的迹象。

再次,美国对华发起的“超贸易”攻势已经发展至国家安全、意识形态、人文交流和外交层面,中美双方的敌对情绪逐步升温。在国民安全和意识形态领域,涉及台湾、新疆、南海和香港问题的中美冲突更加严峻。美国不断干涉中国内政,在2020年3月26日正式通过《台北法案》(*Taipei Act*),插手台湾问题,并在2020年6月17日进一步签署了《维吾尔人权法案》(*Uyghur Human Rights Policy Act*),企图利用所谓的新疆问题煽动中亚国家反华。针对南海问题,美国不再保持中立立场,在2020年7月13日首次正式拒绝中国南海主张。美国针对香港的打压加剧,2020年6月29日,美国正式宣布取消对香港的特殊相关待遇,包括暂停出口许可证豁免等,并于8月11日宣布,自2020年9月25日起,原产自香港的货物出口到美国必须标明来源地是“中国”,不能再贴“香港制造”标签。另外,2020年5月20日,美国发布了《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战略方针》(*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报告,直指中国治理和执政党,大肆渲染所谓的中国对美国制度稳定的威胁和挑战,多次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提出质疑。中美人文交流的空间大幅收窄,特朗普政府将两国人文交流政治化,大肆实施签证限制,阻碍双方学术交流。美国于2020年5月29日明确提出,限制中国高科技领域留学生入境,并于7月14日正式宣布暂停一项中美双方的教育交流项目。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时期,中美互相关闭总领事馆,双方外交冲突加剧。

此外,第三方因素在中美竞争中的分量有所提高,美国企图通过拉拢盟友与其他国家达成反华共识,达到“去中国化”的目的。2020年7月1日,《美墨加协定》(USMCA)正式签订,其中的“毒丸条款”明

确规定了墨西哥和加拿大不能同时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对中国的针对性极强。另外,美国拟推行“经济繁荣网络”(Economic Prosperity Network)的可信赖伙伴联盟和七国集团(G7)扩大会议,以实施对华战略打压。美国希望利用第三方国家力量进一步边缘化中国,中美两国政策环境和竞争态势受到第三方力量的影响增大^[4](P484-486)。

拜登上任后,在“有限的多边主义”政策下,中美贸易摩擦继续向“超贸易”领域的全方位战略竞争加速演变,美国更加关注和强调意识形态武器和同盟关系。

首先,贸易领域的对华制裁仍在持续。2021年3月1日,拜登政府发布《2021年贸易政策议程》(2021 Trade Policy Agenda),表明美国将对中国贸易做法采取强硬立场,重点强调了所谓的“不公平贸易行为”、知识产权保护、贸易规则等结构性问题。此后,2021年10月4日,美国贸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公布了拜登政府的对华贸易新政策,提出美方将启动针对性的关税排除流程,但不排除使用新关税督促中国履行《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的承诺。

其次,美国对华高科技打压升级,遏制手段更加丰富。2021年6月9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审议通过涉及2500亿美元预算支出的《2021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USICA)以应对和对抗中国技术竞争。随后,在9月30日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技术理事会”会议上,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Gina Raimondo)声称将联合欧盟遏制中国技术创新,坚决压制中国高科技发展。

再次,拜登政府将多边主义意识形态化,以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为由强化同盟力量,并意图拉拢盟友共同制定国际规则,遏制中国。2021年,戴琪10月4日的演讲以及拜登10月15日在多德人权中心落成典礼的讲话,均反复提到了所谓的新疆生产中的人权问题,污蔑新疆存在“强迫劳动”现象,企图利用所谓的新疆问题拉拢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施压。另外,2021年6月,拜登陆续出席了七国集团(G7)峰会、北约峰会和欧盟—美国峰会,旨在修复美国与欧洲盟友的关系以抗衡中国。在出访欧洲之前,拜登在6月6日公开提出中国不应该参与全球贸易和技术规则的制定,计划通过拉拢盟友避免中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上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疫情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加速向“超贸易”领域全方位扩散,具有结构性、全面性和体系性。中美多领域竞争摩擦已经出现相互渗透和交叉的特点。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已经渗透至同盟关系层面,延伸至规则制定领域,美国已经将国际规则制定领域的对华制裁与贸易、高科技领域制裁相结合。美国对华遏制的手段和中美冲突的领域更加多元化。双方冲突摩擦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贸易领域,美国已经开始实施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对华脱钩、限制和施压。

(二) 疫情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向“超贸易”领域演变的理论基础与现实逻辑

中国的快速崛起与美国霸权主义之间的根本矛盾,是美国坚决遏制中国发展并持续挑起冲突摩擦的症结所在,中美贸易摩擦向“超贸易”领域演变的根本逻辑和理论基础离不开美国的地缘竞争思维和国内政治逻辑^[5](P84-85)。基于结构现实主义的思想,作为守成大国的美国对快速崛起的中国会产生强烈的威胁感和竞争的压迫感^[6](P3-21),双方结构性矛盾突出,因此,美国不断打压中国,避免自身利益受到威胁,希望实现利益的重新分配^[7](P3)。

从地缘竞争思维的角度来看,首先,地缘竞争本质上是零和博弈的逻辑,一方获利必将造成另一方的损失。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奉行“全球战略”,旨在维护世界领导地位。随着新兴崛起大国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美国在地缘竞争思维的驱使下坚信中国的崛起将对其长期以来的优势地位造成严重威胁,认为中国快速发展的意图就是赶超美国,建立自己的霸权,这就导致中美地缘竞争日益加剧。目前阶段,双方的地缘竞争不再局限于地缘政治竞争,而是开始侧重于地缘经济竞争,经济利益的分配成为美国的关切重点,这使得双方冲突向高科技等更多核心利益领域演变扩散。其次,地缘竞争和大国权利之争关联密切。在国际政治的经典理论中,权力转移理论(Power Transition Theory)重点关注了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冲突摩擦产生的权利政治博弈逻辑,该理论认为国家权力转移一般包括三个阶段:

潜在权力阶段、过渡增长阶段和权力成熟阶段。少部分国家率先进入过渡增长阶段和权力成熟阶段,获得“先发优势”成为主导国家,力求建立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秩序。此后,部分后发大国逐步进入过渡增长阶段和权力成熟阶段,与主导国家之间的力量差距缩小,对现有国际体系产生威胁,容易引发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的冲突摩擦。权力转移理论主要从权力再分配角度分析大国关系,强调体系和结构的重要性,一定程度解释了中美之间大国竞争的结构动因。但是,该理论忽略了单元差异对大国关系的影响,不同单元之间国家体制、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不同,很可能影响特定单元的互动关系,进而决定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互动性质^[8](P57)。这意味着在分析大国关系时,意识形态等因素不容忽视。近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经济全球化下中美两国已经在经济、金融、贸易、科技等多方面构成复杂网络,中美关系也在发生改变。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美国为维持其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领导地位,逐步对中国实施更多领域的制裁,美国对华战略的“规锁”性质日益明显^[9](P24)。

从美国国内政治逻辑的角度来看,美国国内利益集团和精英阶层对中美冲突的演变起到关键作用。一直以来,美国利益集团和政治集团深度捆绑,与政府之间更是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各大利益集团相互争夺,通过游说等方式对美国国会和白宫施压,以争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不仅会影响美国国内政治环境,同样会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方向。在美国涉华利益集团中,钢铁企业、高科技企业支持美国对华采取贸易制裁及高科技制裁,而以美国商会、农业利益集团为首的利益集团,却反对美国对华贸易制裁。各大利益集团在中美冲突中的利益受损程度不同,因此,对中美冲突的态度和立场有所不同。在2020年美国大选期间,特朗普在满足钢铁企业等利益集团的政治诉求的同时,严重损害了农民和美国商会的利益,因此,为获得选举的胜利,不得不安抚这部分利益受损的集团,一定程度推动了《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签订,贸易领域冲突有所缓和。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对华态度仍然受到各大利益集团行为逻辑和行动方向的制约,两党就对华遏制战略的共识使得美国持续实施对华围堵。尤其在后疫情时代中国高科技水平、国际影响力日益提高的情况下,美国高科技等利益集团必然会继续为维护自身利益大力推动对华打压政策^[10](P82-83),秉持“美国第一”认识的精英阶层,也会为中美竞争的持续甚至向更深层次的“超贸易”领域扩散推波助澜。

上述分析从理论层面厘清了中美贸易摩擦演变的根本逻辑和结构性动因,那么,从现实的角度,中美贸易摩擦为何蔓延至高科技、金融、国家安全、意识形态和国际舆论等“超贸易”领域,与疫情存在怎样的关联?

首先,高科技领域一直是中美战略竞争的关键^[11](P68)。《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签订后,美国在贸易领域的诉求逐步得到满足,但仍然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充满担忧。中国已经出现一部分技术领先的高科技企业,因此,美国必然会采取措施遏制中国关键技术发展,希望能够长期控制产业链制高点,攫取垄断利益。叠加疫情冲击下美国经济的严重衰退,美国急于转移国内压力,而高科技领域是触及双方核心竞争力和利益的关键,也是决定全球产业链价值分配格局的核心。因此,中美贸易摩擦继续向更深层次的高科技领域延伸。其次,美国的金融优势显著,历史上美国曾多次依托美元霸权体系,利用金融制裁手段实施对他国的遏制战略,美国对华局部金融制裁能够一定程度达到对特定实体金融压制的目的^[12](P124)。再次,中美双方在价值观、发展模式和制度方面存在固有差异,以意识形态、国家安全等为借口,联合盟国遏制中国发展成为美国打压中国的惯用手段,且考虑到对华制裁的成本,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打压成为美国维护自身利益的有力制裁工具。

疫情是催化中美贸易摩擦继续发酵和演变的新因素。首先,疫情背景下美国的“霸权焦虑”加剧,对华敌意升级,刺激双方舆论竞争加剧。为了将所有疫情相关的责任“甩锅”中国,被“霸权焦虑”支配的美国多次抹黑中国,不遗余力地打压中国。蓬佩奥(Mike Pompeo)作为特朗普政府的“反华急先锋”,声称要组建一个旨在向中国索赔的国际联盟,多次发表毫无根据的辱华言论污蔑中国,美国的焦虑心理和随之升级的对华敌意显而易见。其次,疫情对美国国内经济和产业造成严重打击,为了救济本国产业,拜

登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暂未彻底转变,贸易领域摩擦仍在持续。再次,疫情成为美国推进对华部分产业链“脱钩”的新借口。随着全球疫情的大规模暴发,各国国内产业链构建的重要性愈发明显。表面上美国出于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的考虑,希望通过建立完整的国内生产体系降低风险,实际上则是希望借疫情降低对中国制造业的依赖,通过部分高科技产业链“脱钩”阻碍双方技术和人才流动,遏制中国高科技发展。在疫情的影响下,中美贸易摩擦正在加速演变和扩散。

总体上看,中美冲突的实质在于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以及双方地缘政治、社会制度和核心经济利益的对抗。美国固有的霸权主义与中国的飞速发展存在结构性矛盾,叠加美国国内政治逻辑的影响,拜登政府的上台没有改变美国对华战略定位和中美冲突演变逻辑的整体方向。中美长期以来的矛盾积累使中美关系出现结构性变化,中美冲突已经从局部的贸易领域蔓延至“超贸易”的全领域。疫情成为推动中美贸易摩擦加速演变和升级的“催化剂”,高科技、国家安全、意识形态等涉及核心问题的“超贸易”领域成为美国对华施压的重点领域^[13](P2)。从根本上看,无论是传统的贸易领域制裁,还是全方位对华“超贸易”领域制裁,本质在于遏制中国发展、维护美国霸权地位。中美贸易摩擦已经逐渐演变成两个大国之间的发展模式之争、核心技术之争甚至是意识形态之争,并在疫情的催化下迅速发酵。

二、疫情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演变的主要影响

近几年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双方多轮关税战使得两国经济受损,并逐步扩散至世界其他国家。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美贸易领域摩擦仍在持续,并加速从贸易向“超贸易”领域演变和扩散。在疫情和中美竞争冲突加剧的双重影响下,中美关系的整体氛围恶化,双方经济、贸易、高科技、金融、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等领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两国深陷“安全困境”,并且会严重影响全球经济、贸易和高科技发展,对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产生冲击。

(一) 疫情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演变对中美双方的影响

疫情暴发以来,中美双方贸易和“超贸易”领域的冲突摩擦大面积覆盖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这不仅会加剧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且会对两国造成多方面的复杂影响,使双方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首先,中美关系的整体氛围恶化。美国广泛散布和传播“病毒起源论”“口罩外交论”等污蔑中国的言论,严重恶化了舆论环境。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一致对华强硬态度下,美国政客和媒体抓住这种错误的舆论导向,力求借疫情打压中国。中美双方舆论战的大范围展开导致两国民众的对立情绪高涨,中美关系更加紧张。在双方多轮会谈中,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的诚意明显不足,多次以傲慢姿态与中国对话,这无疑不利于双方关系的缓和。双方舆论竞争的恶化会进一步损害中美之间的战略互信和政治互信。

其次,中美两国的经济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总体上看,疫情叠加贸易摩擦,中美经济受到不同程度的负面冲击。对美国来说,美国在国内疫情肆虐的同时,仍在推进对华遏制战略,美国经济严重下滑,202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为-3.50%^①,达到1946年以来的新低。相比美国,中国迅速战胜疫情,并且经济韧性相对较强^[14](P163-164)。在疫情和美国对华打压升级的情况下,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仍然呈现稳步复苏的状态。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2.30%^②,中国成为应对疫情大流行下全球经济衰退的主要支撑,疫情叠加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剧和演变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在可控范围内^[15](P3-24)。也就是说,疫情和中美贸易摩擦的双重冲击对中美两国的经济均造成不利影响^[16](P1-55)^[17](P41-59)^[18](P77-93),美国经济受到的负面影响明显大于中国。正

① 参见美国经济分析局官网(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https://www.bea.gov/data/gdp/gross-domestic-product>。

② 参见中国国家统计局官网,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2/t20210227_1814154.html。

如部分学者立足疫情叠加中美冲突加剧的现实背景,采用投入产出分析和假设提取法再次证实了中美双方经济受到的负面影响^[19](P60),且有研究发现中美贸易摩擦加速蔓延并恶化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更大^[20](P113-122)。

再次,中美贸易领域摩擦阶段性放缓,中美双边贸易额有所上升,但在疫情的影响下,美国对外贸易短期暴跌。从中美双边贸易状况来看,在疫情暴发初期,中美双方签订《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国在抗击疫情的同时仍然逐步履行扩大自美进口的承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同比增长8.40%,自美进口同比增长10.10%,双边货物贸易总值增长8.80%。中美贸易领域摩擦的短期缓和有利于疫情背景下中美双边贸易规模的扩大。从中美两国对外贸易的总体状况来看,美国对外贸易受到巨大冲击。在疫情暴发初期,美国进出口贸易大幅下滑。美国在2020年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的出口总额分别同比下滑29.78%和12.74%,进口总额同比下滑19.83%和4.47%,2020年全年美国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8.80%,且出口额下降幅度明显大于进口额^①。也就是说,《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签订后,中国对美进口规模的扩大不会根本解决美国贸易失衡问题^[21](P4015-4032)^[22](P1-16)^[23](P61-70)。对于中国来说,2020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90%,其中出口增长4.00%,进口微降0.70%。尽管中国在疫情暴发初期面临美国施压和疫情冲击导致的多方面外贸压力,但中国作为全球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仍然具备巨大的生产优势和市场规模优势,中国进出口贸易在中美贸易摩擦叠加疫情的影响下没有受到过大的冲击。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演变和升级,美国对华贸易领域制裁并未停止,拜登政府上台初期的对华贸易立场仍然较为强硬,中美贸易领域摩擦的持续不利于疫情下中美两国对外贸易的恢复和发展,中美加征关税对美国对外贸易的负面影响更大^[24](P59-72)^[25](P199-240)。

另外,中美贸易摩擦向“超贸易”领域的演变影响中国高科技发展,金融领域受到的冲击有限。美国加快推进对华高科技“脱钩”,对中国关键技术发展实施疯狂围堵^[26](P55-72),阻碍芯片等核心产品流向中国,中国核心技术面临“卡脖子”。短期内,中国科技水平仍然与美国存在差距,需要学习和吸收美国先进技术。短板技术产品的断供会使相关中国企业陷入被动,面临发展困境^[27](P384-392)。对于美国来说,虽然美国对华技术封锁的强势加码能够起到短期遏制中国高科技发展的作用^[28](P8),但双方技术领域的冲突激化会对美国市场和国内产业链产生反向冲击,损害美国的高科技优势。一方面,从人才的角度看,美国对华技术封锁严重阻碍了双方高科技人才的交流,中美冲突的长期持续会削弱美国的人才力量。另一方面,从资金和市场的角度看,中美高科技“脱钩”会导致美国企业失去中国市场,资金链断裂,冲击美国国内产业链,不利于美国高科技企业的发展经营。长期来看,美国对华技术封锁的强硬态度反而有助于倒逼中国企业通过自主研发提高创新能力,加快核心技术产品进口替代的步伐,摆脱技术路径依赖^[29](P77-78),完善国内创新体系。中美高科技领域冲突加剧对中国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在金融领域,中美双方在香港国安立法问题上冲突不断,美国针对涉港企业和中概股企业实施打压,使中国企业赴美上市的成本和审计风险增大^[30]。美国对部分实体机构和个人账户的局部制裁,阻碍部分受制裁机构开展国外业务,对国家整体金融体系的影响较小。目前阶段,我国基于自身发展实际,已经逐步落实扩大金融领域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大力培育有竞争力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撑。因此,我国金融领域开放仍在稳步推进,美国实施小范围的对华金融施压,对中国的影响程度有限。

此外,中美贸易摩擦向意识形态、国家安全等“超贸易”领域演变,中美关系深陷“安全困境”。中美固有的结构性矛盾、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双方核心竞争领域的差距减小等导致美国在霸权思维下的对华焦虑感、恐慌感和不安全感日益加剧。尤其在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中国制度优势的凸显再次加重了美国的危机感。为提高自身安全感,美国不断实施对华更多领域的制裁措施,利用意识形态武

① 参见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 Database),<https://comtrade.un.org/data/>。

器鼓吹“美国吃亏论”“中国威胁论”，企图借疫情大肆渲染意识形态对立。中美意识形态冲突加剧，尤其是涉及国家主权问题、人权问题的冲突恶化，使疫情背景下的中美关系越发紧张，双方需要应对的地区安全问题的范围扩大，性质更加严重，进一步深化两国的“安全困境”。

（二）疫情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演变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中美冲突的变化牵动着世界经济的走向，贸易领域摩擦对贸易伙伴国产生明显的溢出作用，高科技领域“脱钩”冲击全球产业链和技术生态，意识形态之争加剧会影响第三方国家的对华态度，且中美对外政策的变化和规则制定领域的摩擦会对国际格局和秩序产生重要影响。

首先，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剧对全球经济和贸易造成负面冲击，不利于疫情冲击下世界经济的恢复。中美贸易摩擦会通过扩散效应对世界经济造成负面冲击。中美加征关税导致生产者和消费者成本大幅提升，抑制投资，进一步阻碍全球经济增长^[31]。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2019年提出中美贸易摩擦的恶化很可能使全球GDP下滑0.70%，加征关税造成的世界经济损失接近6000.00亿美元^[32]。与此同时，世界贸易严重放缓，在OECD 2019年《中国经济调查报告》中指出，截至2019年4月，中美双方加征关税措施将拖累世界贸易总额0.40个百分点^[33]。部分学者通过模拟分析和经验分析方法再次证实了中美贸易摩擦对全球经济和全球贸易的不利影响^[34](P2-37)。

其次，中美贸易领域摩擦会通过贸易转移效应作用于第三国，并存在正反两方面影响。中国和美国分别作为亚洲区域价值链和北美区域价值链的核心国家，在两国发生经贸摩擦时，与中美经贸往来和利益关联密切的国家会受到明显影响。一方面，中美加征关税导致两国双边贸易额下滑，两国的进口需求会部分转移至其他国家。Bolt等、Ajami、Rosyadi和Widodo分别对中美贸易摩擦下欧洲、亚洲国家受到的贸易和经济影响进行估计，发现贸易转移能够使部分第三方国家获益^[35](P1-2)^[36](P1-3)^[37](P125-145)。另一方面，中国积极履行《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扩大自美进口规模，会对贸易伙伴国产生反向的贸易转移效应。中美双边贸易规模的扩大会挤占其他国家对中国出口份额，不利于第三国贸易增长^[38](P2-12)^[39](P1-10)。疫情席卷全球，大部分国家承受巨大的经济下行压力，而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并向更多领域扩散，不仅会给中美两国带来经济损失，而且会蔓延至其他国家^[40]，对部分国家尤其与中美价值链紧密关联国家的经济、贸易和福利产生重要影响^[41](P89)。

再次，高科技作为中美竞争的核心领域，中美高科技“脱钩”会部分切断全球产业链、破坏全球投资布局 and 贸易秩序，阻碍全球高科技发展。一方面，疫情背景下全球产业链重构趋势明显，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趋于收缩，中美高科技竞争恶化会加剧产业链体系的分化程度，切断部分环节，甚至使第三方国家被迫“选边站”，进一步破坏全球产业链和贸易投资秩序。另一方面，中美高科技领域的冲突蔓延至第三方国家，对其他国家技术进步产生影响，进一步导致全球技术进步放缓。美国为了防止对华技术流出，推动构建以美国为核心的同盟国之间的技术创新合作机制，实施对中国技术合作伙伴国的资金和技术遏制。美国利用第三方国家对美国施压会严重破坏全球技术生态，阻碍国家间技术合作，不利于世界整体科技水平的提高。

此外，美国挑起的意识形态纷争已经渗透至同盟关系领域，第三方国家的对华态度和立场受到影响，甚至冲击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高举意识形态武器拉拢盟友制裁中国，利用中国同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差异，大肆煽动意识形态对立。部分中东欧国家开始向美国倾斜，波罗的海三国陆续跟随美国将中国视为“安全威胁”。2021年5月21日，立陶宛宣布退出中国中东欧国家跨区域合作机制“17+1”，并不断就新疆、台湾等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中美意识形态之争，不仅会影响中美两国关系和中美外交的国际环境，而且会影响其他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甚至对全球地缘政治格局造成冲击。

最后，中美两国对外政策的变化，以及在规则制定方面的摩擦会对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产生影响。中美两国作为世界大国，在国际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双方对外政策的制定以及竞争模式的改变，必然

会影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疫情全球肆虐之际,美国仍然基于强硬的对华政策不遗余力地打压中国,甚至企图通过拉拢盟友干预国际规则维护其世界领导地位,达到边缘化中国的目的。在霸权逻辑的驱使下,美国试图构建符合本国利益的国际合作机制,利用“规则”遏制中国,不仅会危害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利益,而且会冲击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产生全球性的负面影响。

三、疫情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趋势

美国挑起并推动中美贸易摩擦加速向“超贸易”领域演变和扩散。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曾提出中美贸易摩擦没有真正的赢家,美国对华贸易制裁不仅会对中美双方造成严重的打击,同样会给世界经济带来永久的伤痕,并预测中美贸易摩擦将以美国的对外让步告终^[42]。国内很多学者也曾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方向进行预测,大多观点均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停止^[43](P16-20),并且很可能出现高端制造业领域摩擦升级之后的更多领域冲突^[44](P8-9)^[45](P107-114)。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签署后,中国在扩大进口和贸易开放等方面做出承诺,但中国在关键产业和高科技等核心领域没有让步。新冠疫情的暴发,再次激化了中美的矛盾冲突,旧矛盾未化解的同时,叠加疫情背景下的新矛盾,中美在各个方面的角力不仅没有放松,反而出现恶化的趋势,中美两国的博弈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在特朗普执政时期,中美冲突摩擦已经涉及高科技、意识形态、人文交流和外交等领域。在2020年美国大选中,中国被迫成为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焦点,各方势力争相攻击中国,叠加疫情冲击下的中美关系进一步收缩。拜登政府上台后,中美关系的整体发展方向没有改变,只是对华制裁的手段和方式会出现调整。中美之间的竞争、冲突和摩擦将长期存在,美国仍然会对不断崛起的中国实施压制,但不会和中国彻底决裂,双方仍然存在合作的空间,“斗而不破”仍有希望。本文将综合考虑中美双方博弈视角和全球视角下的中美贸易摩擦的未来走向,深入剖析可能的发展趋势。

(一) 博弈视角下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趋势

首先,美国对华贸易领域制裁将趋于理性化。从2021年10月4日戴琪公布的拜登政府对华贸易政策中可以发现,美国表面上承诺开始取消前总统特朗普对来自中国商品征收的部分关税,真正意图却是构建一个符合美国利益的关税排除程序,削减甚至免征不利于疫情背景下美国国内产业发展和经济复苏的关税,保留其他特朗普时期的关税政策作为与中国谈判的筹码。与特朗普政府不计自身损失、不遗余力打压中国的政策手段不同,拜登政府倾向于在降低美国损失的同时对中国施压。此外,戴琪提出美方会重新审议《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不排除使用新关税促使中方遵守协议中的承诺。由于中国对美国商品的进口额目前没有达到协议承诺的标准,即使存在疫情的影响因素,接下来美国仍然可能继续利用第一阶段协议遗留下的所谓中国“把柄”寻求更多的贸易利益,短期内难以开启第二阶段谈判。另外,拜登在上任后的首次外交政策讲话中,已经明确提出知识产权问题,在此后发布的《2021年贸易政策议程》中,美国再次强调了知识产权、政府补贴、经贸规则等问题,可以看出美国将继续针对经贸领域的结构性问题对华施压。总体上看,未来拜登政府虽然不会主动恶化贸易冲突,但显然不会彻底放弃对华贸易制裁,美国将重点就知识产权等问题打压中国,更加重视经贸规则在约束和制裁中国方面的作用,双方贸易领域摩擦将持续存在。

其次,中美高科技领域竞争将趋于复杂化。美国将在针对高科技领域实施对华精准制裁的同时,重视强化和保持美国长期技术优势。一方面,对于中国的技术优势领域,美国仍然可能利用“实体清单”制裁等多种手段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但相比特朗普时期的高科技领域全面“脱钩”战略,拜登政府倾向于有选择的精准“脱钩”^[46](P106)。在拜登政府公布的《2021年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中,美国明确提出将对5G、半导体等重点产业实施政策扶持。也就是说,美国未来将在精准打击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同时,健全美国创新体系。另一方面,拜登政府未来很可能立足下一轮科技革命,从美国优势领域的视角开辟一条中美高科技竞争的新路径。美国未来很可能在量子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加大投入以产生虹吸效应,

吸引全球科研人才的涌入,旨在长期拉大中美两国的技术创新差距。此外,未来美国将在技术规则制定方面继续阻碍中国高科技发展,企图通过行政手段和拉拢盟友将中国排除在外^[47](P12)。拜登政府强调利用“规则”遏制中国发展,未来美国将重点结合盟友力量阻碍中国参与国际技术规则的制定,防止中国在规则制定上掌握较大的话语权。

再次,美国有可能继续实施对华局部金融制裁,双方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的竞争或将加剧^[48](P145-162)。在金融领域,2021年7月9日,拜登签署新行政令促进多领域竞争,金融业仍是重点。未来美国可能继续利用对华金融威胁增加谈判筹码,可能会实施对特定企业、机构的金融封锁和审查,阻碍中国企业赴美上市。在公共卫生领域,疫情的暴发使得美国开始关注在公共卫生领域对中国供应链的过度依赖问题,为防止中国在全球卫生安全体系中的地位过高,美国可能会适当采取措施加强公共卫生安全领域的竞争优势。

最后,未来美国将继续在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领域对华施压,但两国在人文交流和沟通渠道方面的矛盾将有望缓解。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得以体现,美国对华焦虑随之加剧。美国一直以来难以实现所谓的“民主化改造”中国,双方价值观和制度方面的冲突和差异长期存在。在综合考虑制裁成本和双方长期竞争战略后,未来美国将持续在意识形态、国家主权和人权等方面对华打压,在香港、南海、新疆、台湾等问题上的对华挑衅不会停止。未来拜登政府将更重视利用意识形态武器,但相比特朗普政府极端的对华对抗措施,中美意识形态方面的直接冲突烈度将有所降低,美国将采取更加理性、弹性和成熟的方式,实施意识形态领域的对华施压。此外,拜登上台后的首次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已于2021年3月18日至19日举行,并就气候问题等方面达成共识。2021年11月16日,中美元首举行首次视频会晤,双方均表示同意继续通过各种方式保持密切联系。未来双方沟通渠道有望进一步恢复,人文交流出现止跌回升的趋势,中美两国在气候等议题上存在有限合作的可能^[49](P8)。

(二) 全球视角下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趋势

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趋势离不开疫情冲击下的全球大背景。首先,供应链重构趋势明显,区域价值链“三大中心”不断强化。疫情暴发后,全球供应链韧性的不足逐渐显现,并推动了逆全球化的抬头,全球供应链长度趋于缩短,出现纵向分工体系和横向区域化集聚的收缩趋势。很多国家开始重新思考供应链安全问题,倾向于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打造国内健全的供应链体系。另外,后疫情时代以美国为核心的北美区域价值链、以欧盟为核心的欧洲区域价值链和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区域价值链逐渐强化。体系分化不仅导致国际资本流向发生调整,而且使得排他性明显。在此背景下,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不断加强,未来双方很可能在更多领域展开竞争,中美贸易摩擦趋于向更多“超贸易”领域扩散。

此外,第三方力量将起到重要作用。由欧盟、日本等第三方国家构成的力量对接下来中美贸易摩擦的走势十分关键,第三方国家的态度成为中美双方博弈的部分筹码。一方面,第三方国家很可能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求出发选择态度和立场。在中美冲突主要集中在贸易领域的阶段,多数国家抱持观望状态^[50](P10)。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向“超贸易”领域全方位演变和扩散,贸易、高科技、意识形态等多领域的冲突摩擦必然会对部分第三方国家的利益造成影响^[51](P321)。疫情冲击下的全球产业链分化趋势更加明显,中美在高科技、意识形态等核心领域竞争的加剧再次加重了全球产业链的脆弱性,第三方国家的不安感和焦虑感加剧,未来第三方国家的态度可能会根据利益驱动的原则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在美国的拉拢下,第三方国家的态度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虽然特朗普执政时期的多次退群行为损害了盟友关系,但拜登政府倾向于重新返群,以欧洲国家为首选加大力度拉拢盟友,通过加强联盟领导力构建对华围堵网络,联合盟国制衡中国。考虑到军事同盟关系和价值观的因素,部分第三方国家可能在美国的胁迫和拉拢之下参与到遏制中国发展的队伍中,中美矛盾冲突将在第三方国家力量的驱动下进一步复杂化。在目前的国际关系中,想要形成冷战格局是不可能的,多极世界中的联盟关系松散使得中美之间难以彻底“脱钩”。

基于中美双方博弈视角和全球视角的分析,未来中美冲突摩擦将继续从贸易向“超贸易”领域全方位演变和扩散。在贸易领域,美国将在考虑本国损失的同时实施更加理性的对华贸易制裁,重点利用知识产权等结构性问题对华施压。在金融领域,美国或将继续实施小范围和局部的金融制裁。此外,高科技和意识形态领域将成为未来中美竞争摩擦的焦点。中美高科技竞争将更加激烈,美国对华高科技制裁的针对性更强,并将着重培育和强化美国自身的技术优势。中美意识形态之争更趋复杂化,未来美国将继续利用涉台、涉疆、涉港和南海等问题牵制中国,更加重视利用意识形态武器强化同盟关系,借第三方力量多边压制中国。与此同时,中美将在规则制定方面出现更多摩擦,美国将重点利用盟友力量强化其在国际规则制定方面的领导权,并通过行政手段在全球贸易和技术规则制定等方面对华施压^[52](P153)。总体上看,疫情背景下的中美冲突摩擦将在知识产权、高科技、意识形态、国家安全、金融和规则制定等“超贸易”领域蔓延,逐步呈现出多点爆发、打击精准化、冲突常态化和竞争复杂化的特点。未来中美冲突摩擦将在更多“超贸易”领域呈现全方位爆发的态势,美国将对华实施精准打击,第三方因素在中美冲突中的重要性将更加凸显,中美关系将更加复杂和严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崛起与美国霸权主义之间的根本矛盾会导致双方竞争、冲突和摩擦的常态化,美国为维护其大国领导地位而遏制中国发展的目标不会改变,中美贸易摩擦将不断呈现新的变化。拜登政府倾向于多边主义,重视同盟体系、外交合作和规则,未来美国虽然不会在根本问题上对华做出让步,但是对华战略竞争的手段和方式将趋于理性化、弹性化和成熟化。目前阶段美国的注意力可能会聚焦于疫情冲击下国内经济的恢复,对华态度将受到经济和股市下行的制约。长期来看,中美仍然可能在冲突和摩擦存在的同时达成“竞合”关系,实现“斗而不破”的局面。

四、中国的应对之策

在疫情的催化下,中美贸易摩擦加速演变和扩散,中美竞争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未来拜登政府将继续实施对华多领域制裁,且对华竞争的方式将出现调整,中美关系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为有效应对中美竞争的全方位展开,中国应制定更加完善的对美竞争策略,推动构建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

第一,积极推进中美合作,建立多层次沟通渠道,加强风险管控和制度体系优化。中国应秉承主动出击的原则,积极在关键领域加强与美国的沟通协调,推动重启多边框架下的重点问题协商。争取在未来的中美谈判中,在维护中国核心利益和保证原则性问题不退让的同时,切实回应美国的合理关切,力求找到中美利益的平衡点,并重点推动美国对华关税的下降和“实体清单”制裁的解除。对于美国对华制裁领域的扩散和演变,应做到主动防范和提前预警,制定长期的对美竞争策略。大力扶持芯片等核心短板技术产业,提供政策和资金保障,并尽快构建能够满足国际技术贸易规则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着力推进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从“周边化”入手逐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争取构建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新体系,增强金融领域抗冲击能力。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和机构合规建设,避免企业触及敏感地区的高风险交易。

第二,大力提升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努力打造国内完整产业链优势。面对外部不确定性的增加和中美高科技领域竞争的复杂化,中国应努力提高国内产业链、价值链的完整度和紧密度,全面提升中国创新、引才能力,构建更加完善的创新环境。应大力推进国内企业的自主创新和国内全产业链的构建,通过“补短板”实现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尽快实现进口替代,摆脱对自美进口的高科技产品和金融产品的过度依赖,并重视加强下一轮科技革命可能涉及的重点领域发展。同时,继续加强“长板”竞争优势,在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完备的产业体系优势的基础上,促进出口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着力发展技术领先的优势产业集群,培育世界领先技术的核心竞争力,充分发挥合力作用。

第三,着力构建内需增长引擎,在开放和自强中提升抗冲击能力。通过后疫情时代民生投入的增加,促进传统消费的回暖和新型线上消费的持续发展。基于要素市场改革和配套制度改革,以新型城镇

化为主线提振内需,带动消费和投资需求的大幅增长。此外,应努力建设法制化、国际化、市场化的营商环境和安全、高质量的知识产权体系,在扩大开放的同时大力吸引外资。创造良好的产权制度基础,构建一个充满活力的开放经济体系,提高中国在面对贸易摩擦新演变时的抗压能力。

第四,始终坚持多边主义,有效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双循环”发展战略的良性互动。坚持发展中国家站位,以合作共赢为目的,以经贸关系为基础,加快拓展与伙伴国之间的国际合作和经贸联系,充分挖掘和寻求更广泛的战略支持,提高中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和RCEP建设,保持对加入CPTPP和DEPA的积极开放态度。加强中日韩合作并巩固与东盟的经贸往来,促进中国和欧盟国家的互动,推动RCEP国家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并在此基础上促进与“双循环”战略的协同发展。强化国际经济合作区与国内城市群的协调发展,通过集聚国内外人流、物流、资金流等,实现要素的优化配置,促进内外联动和双向投资合作,统筹国内外资源,对冲美国对华多领域施压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 [1] S. Zhao. Rhetoric and Reality of China's Global Leadership in the Context of COVID-19: Implications for the US-led World Order and Liberal 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21, 30(128).
- [2] M. S. Akon, M. Rahman. Reshaping the Global Order in the Post COVID-19 Era: A Critical Analysi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view*, 2020, 2(1).
- [3] 高伟东.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发文: 不要听信“中国隐瞒新冠疫情”之说. 中国经济网, 2020-05-27. [2021-03-10] http://intl.ce.cn/sjjj/qy/202005/27/t20200527_34988733.shtml.
- [4] M. Mastanduno. Partner Politics: Russia, China, and the Challenge of Extending US Hegemony after the Cold War. *Security Studies*, 2019, 28(3).
- [5] 马涛. 美国对华战略规锁下的贸易冲突博弈路径选择. 当代亚太, 2020, (2).
- [6] G.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 Trap?*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7.
- [7] 李伟, 隆国强, 张琦等. 未来15年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和中国战略选择. 管理世界, 2018, (12).
- [8] 王浩.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 理论透视与历史比较. 当代亚太, 2014, (5).
- [9] 张宇燕, 冯维江. 从“接触”到“规锁”: 美国对华战略意图及中美博弈的四种前景. 清华金融评论, 2018, (7).
- [10] 张文宗. 美国涉华经济利益集团与中美贸易摩擦. 美国研究, 2019, (6).
- [11] 周琪. 论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及其决策环境.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9, (3).
- [12] 郑联盛. 美国金融制裁: 框架、清单、模式与影响. 国际经济评论, 2020, (3).
- [13] E. Ratner. Blunting China's Illiberal Order: The Vital Role of Congress in 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China.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2019-01-29. [2022-04-03] http://s3.us-east-1.amazonaws.com/files.cnas.org/documents/Ratner-Testimony-SASC-1.29.19_open.pdf?mtime=20190128170409&focal=none,2021-05-04.
- [14] 林毅夫. 中国的新时代与中美贸易争端.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2).
- [15] 苏立君, 梁俊尚. 构建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的政治经济学投入产出分析.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1, (9).
- [16] P. D. Fajgelbaum, P. K. Goldberg, P. J. Kennedy, et al. The Return to Protectionism.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20, 135 (1).
- [17] 樊海潮, 张丽娜. 中间品贸易与中美贸易摩擦的福利效应: 基于理论与量化分析的研究. 中国工业经济, 2018, (9).
- [18] K. Itakura. Evaluating the Impact of the US-China Trade War. *Asian Economic Policy Review*, 2020, 15(1).
- [19] 赵瑞娜, 倪红福. 全球价值链重构的经济效应——兼论中美经贸摩擦的影响. 中国流通经济, 2020, (5).
- [20] Y. K. Ng. Why Does the US Face Greater Disadvantages in the Trade War with China? *China & World Economy*, 2020, 28(2).
- [21] L. Cui, Y. Sun, R. Melnikiene, et al. Exploring the Impacts of Sino-US Trade Disruptions with a Multi-Regional CGE Model. *Economic Research-Ekonomska Istraživanja*, 2019, 31(1).
- [22] E. Lau, B. Simonetti, I. Trinugroho, et al. *Economics and Finance Readings*. Berlin: Springer, 2020.

- [23] 周金凯. 产业竞争力视角下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的探析. *经济学家*, 2020, (2).
- [24] 吕越, 娄承蓉, 杜映昕等. 基于中美双方征税清单的贸易摩擦影响效应分析. *财经研究*, 2019, (2).
- [25] X. Q. Tu, Y. X. Du, Y. Lu, et al. US-China Trade War: Is Winter Coming for Global Trade.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2020, 25(2).
- [26] C. H. Kwan. The China-US Trade War: Deep-Rooted Causes, Shifting Focus and Uncertain Prospects. *Asian Economic Policy Review*, 2020, 15(1).
- [27] K. Zhang.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on China's Exports: Take Electronic Products Industry as an Example. *Ope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20, 8(8).
- [28] 杨飞. 贸易摩擦、国内市场规模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国际技术竞争的视角. *中国软科学*, 2021, (8).
- [29] 李巍. 从接触到竞争: 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转型.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2019, (5).
- [30] 李巍, 穆睿彤. 中美金融脱钩进行时? 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 2020-06-02. [2021-05-09] <https://www.essra.org.cn/view-1000-703.aspx>.
- [31] G. Adler, L. Cubeddu, G. Gopinath. Taming the Currency Hype. IMF Blog, 2019-08-21. [2022-3-29] <https://blogs.imf.org/2019/08/21/taming-the-currency-hype/>.
- [32] 韩超. 经合组织: 中美贸易摩擦将严重损害美国和世界经济. 文汇报, 2019-05-21. [2020-12-13] <https://www.whb.cn/zh-zhan/rd/20190521/264539.html>.
- [33] OECD. OECD Economic Surveys: China 2019. OECD iLibrary, 2019-05-16. [2021-06-27] https://www.oecd-ilibrary.org/economics/oecd-economic-surveys-china-2019_eco_surveys-chn-2019-en.
- [34] E. Bekkers, S. Schroeter.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US-China Trade Conflict. *WTO Staff Working Paper*, 2020.
- [35] W. Bolt, K. Mavromatis, S. V. Wijnbergen. The Global Macroeconomics of a Trade War: The EAGLE Model on the US-China Trade Conflict. *CEPR Discussion Papers*, 2019.
- [36] R. A. Ajami. US-China Trade War: The Spillover Effect. *Journal of Asia-Pacific Business*, 2020, 21(1).
- [37] S. A. Rosyadi, T. Widodo. Impact of Donald Trump's Tariff Increase against Chinese Imports on Global Economy: 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 (GTAP) Model (Article).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 2018, 16(2).
- [38] S. Chowdhry, G. Felbermayr. The US-China Trade Deal: How the EU and WTO Lose from Managed Trade. *Kiel Policy Brief*, 2020.
- [39] S. Chowdhry, G. Felbermayr. The US-China Trade Deal and Its Impact on China's Key Trading Partners. *Kiel Policy Brief*, 2020.
- [40]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ADO) 2018 Update: Maintaining Stability Amid Heightened Uncertainty. ADB, 2018-12. [2020-07-14] <https://www.adb.org/publications/asian-development-outlook-2018-update>.
- [41] 李跟强, 潘文卿. 中美贸易摩擦、全球价值链分工与福利效应. *统计研究*, 2022, (1).
- [42] P. Krugman. Trump Is Losing His Trade Wars. *The Press Democrat*, 2019-07-07. [2020-05-22] <https://www.pressdemocrat.com/article/opinion/krugman-trump-is-losing-his-trade-wars/>.
- [43] 鞠建东. 中美贸易争端的冲击与中国长期发展路径. *清华金融评论*, 2018, (7).
- [44] 唐宜红, 张鹏杨. 中美贸易之争的演变特征、动因及走势. *经济研究参考*, 2018, (20).
- [45] 佟家栋, 鞠欣. 拜登时期中美战略竞争态势、挑战与应对——基于双边经贸关系视角. *国际经济评论*, 2021, (3).
- [46] K. M. Campbell, J. Sullivan. Competition without Catastrophe: How America Can Both Challenge and Coexist with China. *Foreign Affairs*, 2019, 98(5).
- [47] H. Brands, Z. Cooper. The Great Game with China Is 3D Chess. *Foreign Policy*, 2020-12-30. [2022-03-29]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12/30/china-united-states-great-game-cold-war/>.
- [48] 蒋沁志, 吴维旭, 林冈. 新冠肺炎疫情时期中美在全球卫生安全中的权力变更. *当代亚太*, 2021, (3).
- [49] M. Przychodniak. The Decline of the US: The Chinese Discourse on Post-pandemic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PISM*, 2020-09-21. [2022-03-30] https://www.pism.pl/publications/The_Decline_of_the_US_The_Chinese_Discourse_on_Postpandemic_Relations_with_the_United_States.
- [50] 刘洪钟, 杨攻研. 国际秩序转型、全球化反思与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外部约束. *国际经济评论*, 2020, (5).
- [51] H. Harding, F.R. Frankel. *The India-China Relationship: What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to Know*. New York: Columbia Uni-

versity Press, 2004.

[52] S. Han, H. Jeong. Identifying Joe Biden' China Policy Determinants: Norms & Values Oriented Diplomacy. *Journal of Research Methodology*, 2020, 5(3).

The Transformation of Sino-U.S. Trade Friction and China's Countermeasures under the COVID-19 Pandemic

Shi Benye , Yang Fujia (Jilin University)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Sino-U.S. trade friction is spreading to Super-trade fields rapidly. The Sino-U.S. competition and friction will last for a long period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fundamental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rise of China and American hegemonism as well as the strong intervention of interest groups and eli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has multiple impacts o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affects the global economy seriously. On the one hand, Sino-U.S. trade friction led by the U.S. government under Biden's administration will not stop, and Sino-U.S. trade friction will spread to Super-trade fields rapidly, such as high technology, national security and ideology,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point outbreak", "precision attack", "normalized conflict" and "complicated competition". On the other hand, although the overall direction of Sino-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ll not change, the means and methods of U.S. competition with China will tend to be rational and flexible. It is still possible for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establish the "co-opetition" relationship. China should be actively prepared for the spread of Sino-U.S. trade friction to multiple fields,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and steady development of Sino-U.S. relations.

Key words COVID-19 pandemic; Sino-U.S. trade friction; Super-trade

■ 收稿日期 2021-12-21

■ 作者简介 史本叶, 经济学博士,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吉林 长春 130012;
杨馥嘉(通讯作者),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 何坤翁